

## 废奴前后巴西关于 外来劳动力问题的争论

杜娟

**内容提要：**1850年奴隶贸易被禁止后，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成为巴西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19世纪中后期，巴西数次引进大批华工的尝试几乎都陷于失败。原因在于：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引起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抵制；晚清政府改变了之前对海外移民排斥、冷漠的态度，开始尝试控制和保护本国移民；与支持华工的势力相比，巴西国内反对引进华工的声音和力量更为强大。巴西的种植园主及其政治代理人、温和的废奴派基于其他国家输入华工促进经济繁荣的成功经验，认为华工具有廉价、顺从的优势，力主输入华工以填补巨大的劳动力缺口。而种族主义者、激进的废奴派和知识精英则鼓吹“黄祸论”，以华工会成为新的奴隶以及华工不易被同化为由进行反驳，同时在“白化”思想的影响下积极鼓励引进欧洲移民。在这场争论中，外来移民对于巴西而言不仅是经济符号，也是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符号，争论归根到底是新旧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

**关键词：**巴西 废奴 咖啡经济 华工 欧洲移民  
“白化”思想

**作者简介：**杜娟，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9) 02-0111-22

巴西是西半球最早引进黑奴劳动的地方之一，却是这一地区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的国家。据保守估计，1502—1860年，共有约950万非洲黑人被掠卖至美洲，其中，巴西接收的黑奴人数最多。<sup>①</sup>3个世纪以来，横跨大西洋到达巴西的幸存奴隶数量约为350万。<sup>②</sup>黑奴劳动促成了巴西单一产品制出口经济的持续繁荣。19世纪初独立运动取得胜利后，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相继颁布了废除或限制奴隶制度的法令。巴西虽然在1850年宣布禁止奴隶贸易，但其奴隶制度一直维持到1888年。

巴西禁止奴隶贸易后，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日益突显。首先，随着奴隶贸易在世界范围内被禁止，没有后继奴隶的输入。其次，奴隶劳动本身的再生产能力低。由于长期遭受非人的待遇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再加上男女奴隶比例严重失衡，造成巴西奴隶的高死亡率和低繁殖率。最后，巴西国内奴隶贸易的兴起向咖啡产业转移了一批劳动力，但总体数量有限。巴西东北部蔗糖业的衰落促使奴隶向东南部兴旺发达的咖啡种植园迁移。1864—1874年，东北部蔗糖生产区的奴隶人数从774000人（占巴西奴隶人口的45%）降到435687人（占28%），而咖啡种植区的奴隶人口从645000人（占43%）增至809575人（占56%）。其中，仅圣保罗一个州的奴隶数量就增长了一倍多，从80000人增加到174622人。<sup>③</sup>不过，即便东北部的奴隶全部南下，也仍然不能满足咖啡经济发展所需的巨大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成为巴西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围绕劳动力来源问题，巴西国内不同群体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针对引进华工和欧洲移民这两个群体的讨论最为激烈。这场争论反映出19世纪中后期巴西人的种族观念，是新旧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直接影响了巴西外来移民政策的走向及此后巴西的人口结构。与此同时，早期“巴西人”的民族认同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清晰。目前，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考察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国外学者比较侧重研究19世纪巴西的欧洲移民问题，对华工等亚洲移民的关注不够；二是国内学者更加重视梳理这一时期巴西招募华工的历史过程，对巴西国内有关引进华工和

---

① Katia M. De Queiros Mattos, *To Be Slave in Brazil, 1500 – 1888*,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0.

② [美]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王龙晓译：《巴西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5页。

③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三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790页。

欧洲移民的争辩这一核心问题探讨不足，亦未能阐明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sup>①</sup>鉴于此，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废奴期间巴西试图大规模引进华工遭遇失败为切入点，剖析巴西主要利益群体有关外来劳动力争论的焦点，揭示其背后折射出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

## 一 巴西引进华工的数次尝试

早在殖民地时期，巴西就对引进华工表现出兴趣，并付诸实际行动。1807年英国通过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后，葡萄牙王室和殖民地巴西的官员就曾预设补充劳动力的备选方案。巴伊亚州经济学家、首府萨尔瓦多高级法院法官若昂·罗德里格斯·德布里托（João Rodrigues de Brito）在《关于巴伊亚农业与商业经济政策之函》中，提议输入中国和印度劳工，因为“这两国劳工不仅勤奋能干，且是艺术和农业方面的能工巧匠”。<sup>②</sup>葡萄牙战争与外交大臣利尼亚雷斯伯爵（Conde dos Linhares）甚至设想引进200万华工到巴西，后因其于1812年病逝，该计划不了了之。1808年，为了躲避拿破仑的入侵，葡萄牙王储、摄政王若昂六世率王室成员迁至殖民地巴西。若昂六世试图在巴西种植茶树，以争夺向欧洲出口茶叶的市场。1810年前后，澳门招募了数百名茶农输送到巴西里约热内卢植物园（Botanical Garden），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移民巴西。此后，巴伊亚州萨尔瓦多地区和南部地区也曾招募少量中国茶农试种茶。然而，由于气候和土壤条件不适宜，茶树在巴西始终没有获得大面积种植，再加上生活条件恶劣，茶农心怀不满，纷纷逃离茶园，移居城市，经营饭店或贩卖小商品。根据德国旅行家约翰·莫里兹·鲁根达斯（Johann Moritz Rugendas）的统计，1835

<sup>①</sup> 相关研究的代表作有：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omas E. Skidmore, *Black into White: Race and Nationality in Brazilian Thought*,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Rosana Barbosa, *Immigration and Xenophobia: Portuguese Immigrants in Early 19th Century Rio de Janeiro*, UPA, 2008; Dr Adriano Marini, *Imigranti: Chronicles Italians of a Paulista Brazil*,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5; 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0年；高伟浓著：《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移民史、社团与文化活动的远眺》（上、下册），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太荣、刘正勤著：《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

<sup>②</sup>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0.

年仅约有300名茶农在庄园劳作。<sup>①</sup>最终，茶树并没有变成单一产品制经济的另一株摇钱树，葡萄牙人希图把茶叶发展成大宗出口产品的愿景化为泡影。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到来的数百名茶农与之后到巴西的华工在目的和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由葡萄牙引进、意在开辟新的出口产品，身份是独立的农民；后者是由独立后的巴西政府招募、意在补充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身份是契约劳工。

在巴西禁止奴隶贸易前后，英国和巴西分别提出了引进华工的计划。1843年，为了说服巴西终止从非洲贩卖黑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汉密尔顿·戈登（George Hamilton-Gordon）<sup>②</sup>提议巴西可以输入6万名中国劳工，但遭到巴西众议院的拒绝。

在奴隶贸易被禁止后，1854年年底巴西国会再度讨论招募华工问题，并于12月19日出台《巴西帝国政府关于招聘中国垦农合同条款的指令》，希望引进6000名华工，并对华工的出生地、身份、劳工合同、移民船的条件、旅行费用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855年1月19日，巴西政府公共土地总管路伊斯·佩德雷拉·杜科托·费拉斯（Luíz Pedreira do Coutto Ferraz）致函巴西驻英国公使塞尔西奥·特谢拉·德马塞多（Sérgio Teixeira de Macedo），要求他同英国商业公司商谈招募中国垦农到巴西的事宜，并随函附上《巴西帝国政府关于招聘中国垦农合同条款的指令》。<sup>③</sup>但是，由于英国公司开价太高，双方并未谈妥，巴西“招募6000名华工计划”遂搁浅。

此后，巴西转向美国公司引进华工。1854年，巴西商人马诺埃尔·德阿尔梅达·卡多佐（Manoel de Almeida Cardoso）同美国波士顿的“桑普森—塔潘”（Sampson and Tappan）公司接洽，欲在新加坡招募华工。1855年2月9日，美国公司的“埃莉萨·安娜号”（Elisa Annah）搭载303名华工抵达里约热内卢萨普卡亚港（Sapucaia）。这批劳工合同期限为两年，被安排在皇家海军造船厂干活，由于不能胜任造船工作，不久便被遣散，其中的40人于同年7月被聘至马拉尼昂州金矿做矿工。6月25日，巴西同“桑普森—塔潘”公司签署合同，拟在18个月内输入2000名华工。1856年3月19日，368名华工分乘美国

<sup>①</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7.

<sup>②</sup>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即第四代阿伯丁伯爵（4th Earl of Aberdeen）。

<sup>③</sup> 陈太荣、刘正勤著：《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第17-19页。

“萨拉号” (Sarah) 和巴西“帕拉瓜苏号”军舰 (Fragata Paraguaçu) 抵达里约热内卢。这批劳工被分散到甘蔗园和植物园等地劳作, 但不久后大部分人成了乞丐, 许多人都进过“皇城劳教所”(Casa de Correção)。1856年4月17日, “桑普森—塔潘”公司致函巴方, 通知美国驻中国公使要求今后不得使用美国轮船运送中国“苦力”去巴西, 故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费拉斯感叹道:“(巴西)引进华工的试验引发了可怕的后果……现在我们摆脱了不被任何国家所接受的这些人。”<sup>①</sup> 1862年2月19日, 林肯总统签署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法案, 禁止美国公民利用美国船只从事“苦力贸易”。<sup>②</sup> 至此, 巴西借助美国公司招募华工的路也被堵死。

在这种情况下, 巴西人开始直接招募和运输华工。1859年和1866年, 马诺埃尔·德阿尔梅达·卡多佐公司的轮船分两批共将612名华工运至巴西, 这些华工大多是从新加坡招募的。<sup>③</sup> 1870年7月9日, 巴西政府颁布第4547号法令, 授权马诺埃尔·若泽·达科斯塔·利马·维亚纳 (Manoel José da Costa Lima Viana) 和若昂·安东尼奥·德米兰达—席尔瓦 (João Antonio de Miranda e Silva) 及其所组公司“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Fundão da Sociedade Importadora de Trabalhadores Asiáticos), 负责输入务农的亚洲劳工, 规定从第一批劳工抵达巴西港口之日起10年有效, 在此期间, 不允许任何公司从同一地点输入用于相同目的的劳工。<sup>④</sup> 1872年10月2日, 该法令有效期延长至1874年11月11日。该法名为输入亚洲劳工, 实际意为为种植园征召长期合同的华工。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随后在香港、澳门和广州开展招募工作。尽管当时全世界都在声讨苦力贸易, 1874年年初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还是从广州贩运约1000名华工到米纳斯吉拉斯州, 在英资圣约翰·德尔雷伊矿业公司 (Saint John del Rey Mining Company) 属下的“老山矿”(Mina de Morro Velho, 位于今新利马市) 开采黄金。<sup>⑤</sup> 1875年, 该公司

<sup>①</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9–20.

<sup>②</sup> “An Act to Prohibit the ‘Coolie Trade’ by American Citizens in American Vessels”, February 19, 1862. <http://legisworks.org/sal/12/stats/STATUTE-12-Pg340.pdf>. [2018-01-06]

<sup>③</sup> Robert Conrad, “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1893”,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9, No. 1, Spring, 1975, p. 43.

<sup>④</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

<sup>⑤</sup> 陈太荣、刘正勤著:《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第21–24页。

又试图从广东和加利福尼亚招募华工，但被清政府和美国拒绝。无奈之下，1877年，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敦促巴西政府尽快与清政府签署商贸协定，以便直接从中国引进华工。

1879年，受巴西政府总理若昂·林斯·维埃拉·坎桑桑·锡宁布（João Lins Vieira Cansancã de Sinimbu）之托，巴西驻英国公使主动约见清政府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表达巴西与中国建交、通商、招工的愿望。曾纪泽遂将此消息通报给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李鸿章。“顷接李相来函，言巴西之能否善待华工，固未可知，要以不与立约最为省事，若必缠扰不休，亦维坚拒招工，庶议约之时，或稍就我范围云云。……愚意则以为‘招工’二字宜毅然拒之，‘议约’二字宜慨然许之。”<sup>①</sup>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曾纪泽明确表示立约可谈、招工事宜不可谈的立场。1880年7月8日，巴西驻巴拉圭公使爱德华多·喀拉多（Eduardo Callado）和驻欧洲海军武官亚瑟·西尔维拉·达穆达（Arthur Silveira da Motta）被委任特命全权公使率团抵达天津，与清廷全权代表李鸿章进行会谈。在谈及招工事宜时，李鸿章提出，两国之间的移民往来（包括招工在内）必须出于双方人民的自愿，绝不得使用勉强或利诱手段；其在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称：“招工一节，应自坚拒。将来果若提及，必为设法杜绝。”1880年9月5日，两国签署《中国—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草约》），共16款。但巴西政府对条约中治外法权等条款持有异议，佩德罗二世未予以批准。而后双方继续谈判，并于1881年10月3日正式签署《中巴和好通商条约》（又称《天津条约》），共17款。翌年，双方代表在上海换约生效，宣布建交。<sup>②</sup>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1880年拟定的旧版条约，还是1881年达成的新修条款，均未涉及在华招工的内容。《草约》中，“嗣以秘鲁条约为底本，删去招工各条，并参用别国一条，定为十六（七）款”；而《天津条约》仅第一款规定：“嗣后大清国与大巴西国暨厥人民永存和好，永敦睦谊，彼此皆可前往侨居，须由本人自愿，各获保护身家财产，并一律与相待最优之国民人，同获恩施利益。”“是时华民在巴西者，据（巴西使臣）喀拉多告李文忠，言有二千余名，文忠恐其续行广招，比如秘鲁、古巴种种流弊，先与此

①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68页。

② 伍杰主编：《中外旧约辞典》，青岛：青岛出版社，1992年，第50-51页。

款补由本人自愿一语，以杜其渐”。<sup>①</sup> 巴西企图通过与清政府建交大量引进华工的愿望再次落空。

在全权代表与清政府谈判的同时，巴西国内的利益相关方也在为招募华工积极游说奔走，但效果甚微。1880年3月，圣保罗州议会讨论征召1000名华工的经费预算议案。会上，锡宁布以“（华工）聪明……迄今为止没有（劳动力）竞争对手，绝不是霍屯督人（Hotentote）、祖鲁人（Zulu）等非洲种族可以相比的”为由进行施压。但议案最终并未获得通过。1881年年初，圣保罗的一些咖啡种植园主试图绕过清廷，派曾在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留学的若泽·库斯托迪奥·阿尔维斯·德利马博士（José Custódio Alves de Lima）赴美招募3000名华工，结果一无所获。

此外，巴西还试图同中国民间海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建立航线运送华工，但同样以失败告终。1880年7月抵达天津授命与清廷商谈建交事宜的巴西专使喀拉多，身上还肩负着开辟中巴航线的使命。在会谈期间，他多次前往上海同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的助理巴特勒（G. C. Butler）<sup>②</sup> 进行接触，希望中国商船能够为巴西输送华工，并在返航时装载巴西的咖啡、烟草和木材等出口商品。后经巴特勒引荐，喀拉多与唐廷枢直接会面。巴西为何选择轮船招商局？除了它是晚清第一家官督商办的民营企业、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海运业务比较成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总办唐廷枢的个人背景。唐廷枢是广东香山县人，唐家是洋行买办世家，家族与葡萄牙商人往来频繁，控制着澳门的虾酱业。当时，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正在筹划增资扩充营业，“现在各口生意既可自立，极应开拓外洋生意”<sup>③</sup>，所以面对大洋彼岸抛来的橄榄枝，他愿意抱着谨慎的态度进行尝试。在唐廷枢眼中，巴西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而有关招募华工，他指出只有体面的工资才能吸引好工人，绝不接受在南美洲和古巴那样以恶毒契约为基础的损害华工利益的移民企图，所有契约必须明确保证“同其他最惠国一样平等对待中国移民”。在此基础上，1882年年中，轮船招商局拟定了招工草约。主要内容

<sup>①</sup> 《总理衙门奏巴西立约可由南北洋大臣请旨办理折》，光绪六年二月十四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咨总理衙门呈送巴西喀使晤谈节略》，光绪六年六月初六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报巴西使臣抵津折》，光绪六年六月初八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报已与巴西草签条约十七条折》，光绪六年八月初六日；《中巴和好条约（十七款）》，光绪七年八月十一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三）：中国官文书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9-1201页。

<sup>②</sup> 巴特勒是一个住在上海的美国人，曾担任曾纪泽的顾问。

<sup>③</sup> 汪敬虞著：《唐廷枢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04页。

包含：给予3年每年10万墨西哥鹰洋（Mexican dollar）的补贴；招商局享有同英国皇家邮政公司一样的特权；每年6个来回，每次运送1000~1200人；华工享有免费的住宿和餐食，工资按月付；为了避免出现旧（契约）体制的延续，旅费应直接付给轮船招商局而非巴西政府或雇主。<sup>①</sup> 喀拉多表示同意，并回国积极运作。

1883年2月，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中国贸易与移民公司（Companhia de Comércio e Imigração Chinesa, CCIC）在里约热内卢成立，拟在3年内引进2.1万名华工。7月，该公司与唐廷枢达成合同文本，待他来巴西访问时正式签署。1883年10月，唐廷枢和巴特勒到达巴西。此行他有三个目的，考察巴西的种植园经济、觐见巴西帝国皇帝、签署招工合同。他先同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州的种植园主进行会谈，并在其下榻的圣保罗大酒店宣布将与巴西签署一个5年的招工合同。而后10月13日，他朝见了佩德罗二世。但此次会晤后，唐廷枢和巴特勒突然离开巴西前往英国，中巴航线无疾而终。中国贸易与移民公司的计划破产了，该公司也于1883年11月解散。

究竟在巴西考察的两个月期间发生了什么，让唐廷枢毅然决然地放弃航南美的计划呢？我们或许可以从《沪报》1885年12月1日的报道中看出些蛛丝马迹。“溯查巴西一国，自从前与中国订立通商和约以来，因贾公使屡请本局放船到彼国通商，希冀鼓舞华工，前往彼国，自愿津贴巨款。廷枢因念南洋生意，历年未能得手，极欲将致远、图南、美富等船，改走西洋。故定出洋游历之行，特践贾公使之约。于（光绪）九年三月间亲诣该国，面谈商务，连住两月，明察暗访，知彼国黑奴之例未删，疑待华人，不甚周妥，不敢承揽。”<sup>②</sup> 由此可见导致这一计划泡汤的第一个原因是唐廷枢发现奴隶制在巴西仍然存在，这有悖于当时国际社会废止苦力贸易的大环境，以及清政府保护华工权益的政策立场。第二个原因是巴西政府拒绝向轮船招商局支付每年10万美元的补贴，改由种植园主承担这笔费用。唐廷枢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将在实际上构成雇主和华工之间的（苦力）契约关系，华工势必会债务缠身，再次沦为奴隶。他当即就向佩德罗二世亮明立场：“此事不必再谈下

<sup>①</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0-31.

<sup>②</sup> 汪敬虞著：《唐廷枢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97页。



去，我不参与运送中国人到此，除非以自由移民引进。”<sup>①</sup> 第三个原因是考察期间唐廷枢感受到巴西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曾作为遣华专使团成员的恩里克·卡洛斯·里贝罗·里斯博阿（Henrique Carlos Ribeiro Lisboa）也参与了佩德罗二世接见唐廷枢的工作。根据他的记述，佩德罗二世告知唐廷枢，巴西存在普遍的反华情绪。接见完，佩德罗二世还说，“我确信这些人的种族影响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国民的不纯洁性”。《德意志报纸》（*Deutsche Zeitung*）的主编卡尔·冯·科塞里茨（Karl von Koseritz）曾嘲讽唐廷枢是贩卖“蒙古人肉”的商人。经过明察暗访之后，唐廷枢在给中国贸易与移民公司的信中写道：“（我）对贵国政府的偏见和知识精英对华工的排斥感到惊愕。”<sup>②</sup>

从以上梳理不难发现，19世纪中后期，巴西曾多次多方努力试图从中国引进大批华工，但无论是官方交涉还是私下招募，不管是直接引进还是间接输入，几乎所有尝试都陷于失败。由于巴西帝国政府始终未与清政府达成任何招工协议，所以这一时期华工的招募和输入都是以曲线方式秘密进行的，不论是美国公司运送的还是巴西公司承运的华工，在本质上都不具有合法性。

## 二 大规模引进华工失败的原因和巴西国内对此的争论

19世纪华工从未被大量引入巴西，与国际上开始对苦力贸易的抵制、晚清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政策有很大关系。19世纪中后期，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引起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抵制。1855年，英国政府颁布《中国乘客法案》，此为“防止从香港出口的苦力船上发生同样（死难）性质的事件而施行的法令规章”，并以此照会葡萄牙外交大臣督促“澳门总督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措施，以使澳门方面不再出现足以为人道造成耻辱的移民出洋办法”；1862年，美国政府颁布禁止从事“苦力贸易”的法令；1873年，葡萄牙“正式宣布禁止经过澳门港口和市内移送中国契约移民出洋”<sup>③</sup>。而这一时期，巴西大规模输入华工有借自由移民之名行苦力贸易之实的嫌疑。在此背景下，晚清政府

<sup>①</sup>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0.

<sup>②</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2–33.

<sup>③</sup>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0页，第489页。

改变了之前对海外移民排斥、冷漠的态度，开始尝试控制和保护本国移民。在苦力贸易存在的30年间（1845—1874年），清政府的政策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1845—1859年，坚持严禁海外移民的传统政策，且拒绝正视移民在目的国产生的问题；1860—1874年，承认国民向外移民的权利，护侨意识开始萌芽，区分苦力贸易和自由移民，试图管理并禁止苦力贸易。《总理衙门致英法两国公使的照会》和1866年的《北京章程》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首次视保护海外移民为其对臣民的应尽职责。<sup>①</sup>随着秘鲁和古巴虐待华工的传闻愈演愈烈、苦力船上的噩耗频频传来，清政府再也不能坐视不管。1874年，清政府查禁苦力贸易，只允许向缔结商贸协定的国家输送自由移民。此外，清廷还派遣调查团赴古巴和秘鲁，并在此后的谈判中为华工力争权益。这些都展示了清政府保护海外移民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在与巴西建交的谈判中坚决拒绝对方招工的要求，官督商办背景的轮船招商局也断不敢为了逐利而损害民族大义。

然而，巴西大规模引进华工的尝试遭到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巴西国内有关引进华工的争议。与支持华工的势力相比，巴西国内反对引进华工的声音和力量更为强大。支持方大多为巴西的种植园主、政府官员和温和的废奴派，他们主要基于如下一些因素力主输入华工。

其一，华工相对较为廉价。帝国政府中的挺华派代表人物是总理锡宁布。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华工价格比欧洲劳工更为低廉，他们很温和，能够接受较低的薪水，从而为雇主创造更多的利润，“我们需要廉价劳工，而这正是中国人的优势”。1879年，锡宁布要求巴西驻纽约总领事德门东萨（Salvador de Mendonça）提供一份关于华工的报告。后来，德门东萨出版了《亚洲劳工》一书，书中写道：“华工像奴隶一样便宜，却更熟练和聪明……（引进华工）是帮助我们渡过当下危机的唯一办法。”他对招募华工持乐观态度，理由是中国的人口稠密、经济困难，且华工习惯于比世界其他地方都低的工资。巴西外交部长德巴罗斯（Moreira de Barros）也称，中国人生活最简朴，很聪颖，能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要求很少。从政府官员的角度讲，降低劳动力成本显然有助于提高巴西农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的高层声称，中国人勤劳能干、生活

<sup>①</sup> 有关晚清政府移民政策的转变，参见〔澳〕颜清湟著，粟明鲜、贺跃夫译：《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第81页，第102—120页。

简朴、天生就极具耐心。1878年南部各州举行了农业大会，专门讨论农业发展和劳工问题，大多数种植园主表示，“廉价、稳重和听话的”劳工才适宜于大地产农业劳作，这种劳工只能在中国找到。一些种植园主更为精打细算，他们认为华工不挑食，能够很快适应豆类和风干牛肉条等当地饮食，这也可以为雇主节省开支。<sup>①</sup>

其二，华工比较顺从。一位巴西众议院的议员坦言，“让我们更真诚一些”，“我们从祖辈那里受到的教育和我们叱令奴隶的习惯，让我们不习惯于跟自由劳工分享权利”。圣保罗州议会的一位官员称，“我们所需要的农业工人不是新的议会代言人，也非行使政治权力的人，而仅仅是工人，劳动工具而已”。种植园主们也不愿意看到政治精明的欧洲人与他们竞争政治经济权力，或者引进超前的新思想。<sup>②</sup> 1870年巴西政府颁布第4547号法令后，半官方组织——国家工业辅助协会积极响应，拓殖部（Colonization Section）成员加尔瓦奥（I. C. Galvão）、德马赛多（Miguel Galmon Menezes de Macedo）和德蒙特莫伦西（Thomaz Deschamps de Montmorency）撰文支持“十年引进华工计划”。这些人坚称，中国人“没有野心成为地主……他们只有一个愿望——衣锦还乡”，他们安静地劳作，在履行完契约后就会离开巴西，所以中国人是理想的非欧洲移民。<sup>③</sup> 与其说用华工替代黑奴在种植园中劳作的经济角色，不如说让华工填补废奴后底层的社会空缺，以供养和维系巴西传统的等级秩序。

其三，其他国家输入华工促进经济繁荣的成功经验。1848年出版的《务实的甘蔗种植园主》<sup>④</sup> 是巴西农业界的畅销书，也是国家工业辅助协会成员的必读手册。作者伦纳德·雷（Leonard Wray）本人就是种植园主，曾在牙买加、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经营了16年的甘蔗种植园，对不同地区的甘蔗种植业和劳动力情况了如指掌。他认为，华工聪明、勤奋、有进取心，是最理想的移民群体。1877年，佩斯（Pedro Dias Gordilho Paes Leme）写了一封致巴西

<sup>①</sup> Robert Conrad, “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 - 1893”, Vol. 9, No. 1, Spring, 1975, p. 52;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8.

<sup>②</sup> Robert Conrad, “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 - 1893”, Vol. 9, No. 1, Spring, 1975, p. 53.

<sup>③</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2.

<sup>④</sup> Leonard Wray, *The Practical Sugar Planter: A Complete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he Sugar - Cane*, London: Smith, Elder, 1848.

政治家和种植园主的公开信，名为《我们的农业》。他在信中强调，根据其在美国加州、古巴、加勒比的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的实地考察，引进华工是可行的。<sup>①</sup> 废奴派联邦代表塔瓦雷斯（Aureliano Candido Tavares Bastos）非常推崇美国和英属加勒比地区引进华工促进经济增长的经验，认为中国人“勤俭节约、不屈不挠并有商业天赋”；他的废奴思想比较温和，支持种族融合，主张不同种族间的交融可以产生一个“精力充沛、机智聪明和能力出众”的新民族。作为1878年农业大会的召集人，锡宁布在开幕致辞中说，欧洲移民对成为地主而非雇佣工人更感兴趣，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地都因使用华工而大获成功，所以应借鉴这些地方的劳动模式。<sup>②</sup>

反对方主要为巴西的种族主义者、激进的废奴派和知识精英。他们基于如下理由反对输入华工。

其一，“黄祸论”的种族偏见。19世纪中后期，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巴西的精英阶层对中国人大多持有种族偏见，他们在巴西每一次欲引进华工的关键时间节点都会发出强烈的反对声。1854年巴西国会《巴西帝国政府关于招聘中国垦农合同条款的指令》一下达，立即遭到种族主义者的抨击。他们认为，华工“既不能为巴西的农业提供知识，也无助于提高我们的道德和文明”；中国人的体貌特征“天生就是退化的”，“清王朝把最肮脏、最迟钝、最愚昧、最笨拙、对于这个退化民族最没用”的人口输出到国外，“中国人不像黑人那样强壮，也缺乏欧洲人的耐心和定力”。除了在人种和品性上污蔑中国人，种族主义者对大批华工的到来给巴西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加担忧，“黄祸论”甚嚣尘上。1870年7月9日，巴西政府授权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招募华工，再加上《新生儿自由法》颁布后，有关是否引进华工的争论进入白炽化阶段。1875年，国家工业辅助协会农业部的莫雷拉（Nicolão Joaquim Moreira）坚称，巴西需要的是“有定居意愿的、品行端正的人口”，“进口华工或苦力，即便不比非洲奴隶更差的话，也将有损于我们的公民和政治教育”。<sup>③</sup> 种族主义者设想，大批华工的到来会在巴西城市造成“种

<sup>①</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5.

<sup>②</sup>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47-48.

<sup>③</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8, p. 24.

族飞地”，在那里充斥着地方病、鸦片、长辫子和外邦宗教。1879年，巴西自由党人、废奴派代表纳布柯（Joaquim Nabuco）在众议院宣称，中国人会带来种族冲突，并使巴西现有人口退化。他不认同“高等”种族总能在生存斗争中获胜的观点，而是主张当更智慧的种族与低等种族接触时，他们有时会被征服甚至被取代；决定一个种族存亡的并不是智力水平和文明程度，而是生存和繁殖的能力。他认为，中国人即使被“高等”种族征服、统治和奴役，也会在任何允许他们定居的国家“泛滥成灾”；中国人在履行完契约后并不会返回家乡，相反他们会在巴西的城市聚居，垄断工业和贸易，并与巴西工人竞争。<sup>①</sup>

其二，担心华工会成为新的奴隶。在废奴派眼中，1870年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与华工实际签订的契约与第4547号法令提供的契约模板有很大出入，对工人非常不利，此为他们指证华工是新奴隶的最直接有力的证据。基金会契约规定，华工必须服从雇主或其代理人；雇主有权将工人的契约转让给其他雇主或将雇工租给其他雇主，这简直是脱胎于奴隶和奴隶主间的关系；华工的工作时间全由雇主说了算；华工因病误工8天就要停发薪水，直到能够复工；由于一个雇佣周期内无法还清雇主的债务，华工只能与雇主签订新的契约，否则就必须在2个月内自费离开巴西，很显然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旅费。这无异于签了卖身契，华工只能永远充当廉价的农业劳动力。巴尔博扎（Rui Barbosa）谴责契约华工制度是“一种新的奴隶制度，如同非洲奴隶制那样是邪恶的、不道德的、灾难性的”。雷博萨斯（André Rebouças）称，在巴西“工人”（braço）一词就意味着奴隶“或试图用介于奴隶和农奴中间的中国人取代他（奴隶）的企图”。纳布柯直言，“苦力贸易”会成为“一种新的奴隶贸易”，“（巴西劳动力的）悲惨境遇将在华工身上重现，奴隶制将得以延续”。1880年，当巴西与清政府接洽商谈建交事宜时，巴西废奴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代表莱莫斯（Miguel Lemos）致函曾纪泽，强调中国文明的重要性，抨击将华工视作廉价劳动力等轻蔑中国人的观点，揭露锡宁布政府遣华使团的使命是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奴隶制度，以延长旧体制。《消息晚报》（*Gazeta da Tarde*）主编杜帕特罗西尼奥（José do Patrocínio）也是一名坚定的废奴派，他撰文称：“有关中国劳工，我们的种植园主达成了惊人的共识：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件事情（奴隶制）。颈手枷取代鞭子和竹棍继续维持统治。甚

<sup>①</sup> Robert Conrad, “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 - 1893”, Vol. 9, No. 1, Spring, 1975, p. 49.

至连食物都不用变换。”<sup>①</sup>

其三，认为华人不易被同化。针对巴西政府颁布的第4547号法令，国家工业辅助协会成员莫雷拉抱怨称，“中国人不会留在巴西，也不会与国人通婚”，所以他们对于巴西的自我完善毫无裨益。对此，该协会第二副会长阿泽维多（Joaquim Antonio d’Azevedo）表示赞同。他认为，巴西所需要的外来移民是能够创建拓殖地、并有永久居留意愿的人。<sup>②</sup>

需要注意的是，有关输入华工的可行性，无论是以种植园主为代表的支持方，还是以废奴派为代表的反对方，都持有种族主义观点，双方并没有绝对清晰的界线。这一点在咖啡种植园主德拉塞尔达（Luiz Peixoto de Lacerda Werneck）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德拉塞尔达从罗马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经常在里约热内卢的《商报》（*Jornal do Comércio*）上发表文章。他声称，“卑鄙的利己主义、狂妄自大、弃婴和斩首所反映出来的残暴愚昧……是中国人的真实写照”；“他们故步自封、停滞在所谓的‘文明’之中，不思进取，势必会被负有使命、以福音和文明武装起来的欧美国家侵占和消灭”；中国文化会使遭受印第安人和非洲人扭曲的巴西民众“蜕化”，虽然正在形成的巴西民族还不够强大，但也能战胜数百万低等的亚洲人。<sup>③</sup>然而，获取利益而非民族的进步和文明，才是种植园主们最为看重的。“廉价、温顺”的华工显然更符合种植园主的切身利益，能够降低他们的商品生产成本，从而帮助其实现利益最大化。正因为此，种植园主们才在引进华工问题上投出了支持票。从这个意义上讲，种植园主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

在种族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下，1890年6月28日巴西共和国政府颁布第528号法令，宣布在没有国会特别批准的情况下禁止非洲人和亚洲人进入巴西，并建立港口警察对过往船只进行监查，对违反此法令的船长课以罚款。<sup>④</sup>由此，巴西国内有关引进华工问题的大辩论暂时告一段落。

<sup>①</sup> Robert Conrad, “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 - 1893”,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9, No. 1, Spring, 1975, pp. 50 - 51.

<sup>②</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2.

<sup>③</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9; Robert Conrad, “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 - 1893”, Vol. 9, No. 1, Spring, 1975, p. 48; 陈太荣、刘正勤著：《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第26 - 27页。

<sup>④</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3.

### 三 “白化”思想下鼓励欧洲移民政策的形成

与反对华工的话语相对应的，是积极鼓励引进欧洲移民。1867年佩德罗二世曾在御前演讲中表明，如果不考虑欧洲移民问题就不能讨论奴隶解放，二者密不可分。<sup>①</sup>此外，巴西精英们把发展典范美国的成功归因于两个因素：一是在种族构成上的欧洲人优势，二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借用了欧洲人的思想体系。

近代生物学和人种学的发展、进化论的普及和拉丁美洲复杂的种族结构，激发了巴西人对种族和种族理论的极大兴趣。德国著名科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在其1776年出版的《人类的自然类别》<sup>②</sup>中提出五分法，即人类有五个人种：蒙古人种（黄色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黑色人种）、美洲人种（红色人种）、马来人种（棕色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白色人种），并对人种的高低进行排序，最高级的是高加索人种，中间是蒙古人种，最低等的是埃塞俄比亚人种。在其后的几十年中，研究人员将美洲人种和马来人种归并于蒙古人种，由此便形成三大人种：黑种人、白种人和黄种人。而后，欧洲人用一系列重要的伪科学书籍来证明白种人的优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法国社会思想家约瑟夫·阿瑟·戈宾诺（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及其代表作《人种不平等论》。<sup>③</sup>

巴西精英将欧洲文明视作自己的文化导师，并试图在南美大陆上复制出欧洲文明。受欧洲种族主义影响，巴西精英们普遍认为肤色白皙的人漂亮、聪明、有能力，相反，肤色越黑的人就越不可能拥有这些优点。然而，巴西的人种构成让这些精英们非常尴尬。在独立初期，巴西404万人口中，约有一半（48.5%）是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约占27.7%，白人仅占23.8%。在智慧的“导师”看来，巴西人的思想中总是表现出太多“野蛮”的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特点，这与其追求的“文明”形象相差甚远。于是，

<sup>①</sup> [美]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王龙晓译：《巴西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1页。

<sup>②</sup>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On the Natural Varieties of Mankind: De Generis Humani Varietate Native*, New York: Bergman Publishers, 1969.

<sup>③</sup> 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Wentworth Press, 2016.

巴西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决定做一场“白化”(whiteness)民族的大实验,他们一方面添加白色“试剂”(鼓吹引进欧洲移民),另一方面不断“搅拌”(鼓励种族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原液中黑色“试剂”的剂量越来越减少,量杯最终呈现出来的巴西颜色由深变浅。巴西精英坚信,“种族融合可以避免‘退化’,持续不断的‘白化’可以产生更为强健的人口,这种强健既体现在文化上,也表现在体征上。”<sup>①</sup>可以说,巴西的政策制定者运用所谓的“优生学”理论,将引进外来移民和改变种族结构联系在一起。在统治者看来,输入欧洲移民是通过“漂白”民族使巴西变得更为“文明”的一条捷径。

1823年5月30日,里约热内卢报纸《镜报》(*O Espelho*)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慈善家”(Philanthropist)的长信。作者在信中指出,“奴隶制是侵蚀巴西的癌症”,对巴西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并使巴西人变得低效无用,“奴隶主习惯为所欲为,无视法律”,“他们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对此,可以依靠引进移民的方式终结奴隶制,并开发边远地区,促进巴西的现代化。后来,经过巴西历史学家维安纳(Hélio Vianna)的考证,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巴西帝国的皇帝佩德罗一世。<sup>②</sup>可见,这位巴西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早就将引进外来移民纳入自己的治国方略。佩德罗一世的忠实拥趸、被誉为“巴西独立之父”的德安德拉达—席尔瓦(José Bonifácio de Andrada e Silva)<sup>③</sup>认为,欧洲移民比奴隶效率更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在确保巴西不发生经济剧变的前提下加速废除奴隶制。此外,他还道出了佩德罗一世引进移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派移民驻扎和拓殖南部边境地区,防止阿根廷的扩张。1825—1828年,巴西和阿根廷为了争夺具有战略意义的拉普拉塔河东岸地区而爆发了“第一次乌拉圭战争”,最终以乌拉圭独立宣告结束。席尔瓦观察到,1829年阿根廷军事独裁者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在该地区附近安置了许多西班牙移民。对此,他提出巴西也应当引进移民开拓边疆,因为只有新来的人才愿意被安置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在他看来,中欧人是最合适的移民人选。与席尔瓦的看法一致,皇后玛丽亚·莱奥波尔迪娜(Maria Leopoldina)

<sup>①</sup> Thomas E. Skidmore, *Black into White: Race and Nationality in Brazilian Thought*,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65.

<sup>②</sup>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7.

<sup>③</sup> 当佩德罗还是巴西摄政王的时候,德安德拉达担任他的顾问和首席大臣。后来,他力促佩德罗于1822年从葡萄牙独立出来,并在佩德罗登基为宪政皇帝后,出任内政兼外交大臣。1831—1833年,他是佩德罗二世的家庭教师。



也支持引进中欧移民。莱奥波尔迪娜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 (Francis II, 1792—1806 年) 的女儿, 生长于奥地利, 她坚信中欧人文化素养高、有精湛的农艺水平和民族自豪感, 能够很快从移民身份转变为忠诚的巴西国民, 从而促进巴西的发展。这种看法得到了许多巴西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认同。

随后, 巴西政府出台了针对德语国家的移民计划, 包括征召数千名士兵充当外籍军团和招募独立小农, 并承诺让每个农民租种一块狭长的土地“皮卡达”(picada), 承担他们的旅费、立即入籍和十年免征税等优惠措施。1824 年 1 月, 第一批 284 名移民到达里约热内卢港。在随后的 6 年间, 又有 5350 名中欧移民陆续来到巴西南部。他们大多被安置在南里奥格兰德州首府阿雷格里港北部一个名叫圣莱奥波尔多 (São Leopoldo) 的地方。其中的许多人参加了第一次乌拉圭战争。<sup>①</sup>

由于独立后秉持低关税的自由贸易政策, 致使巴西政府从关税和赋税中所获得的收益很少, 糖价持续下跌, 咖啡业尚未壮大, 棉花效益更少, 再加上与邻国长达 4 年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政经费, 巴西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1830 年, 巴西政府宣布停止对移民的资助, 要求移民自付费用方能取得入境许可。在这种情况下, 前往巴西的欧洲移民就更少了。当时, 在欧洲人心目中, 巴西存在如下劣势。其一, 社会氛围不佳。当时巴西还未禁止奴隶贸易, 社会上有一半是黑人, 欧洲种族主义者不愿与大量黑奴并肩劳作, 只要奴隶制仍然有活力, 欧洲人就不会被吸引到巴西。其二, 经济条件较差。当时, 经济更为发达的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是欧洲移民比较青睐的国家。1815—1871 年, 德国移民中的 85% 去了美国和加拿大, 只有 5% ~ 8% 的移民去往巴西。<sup>②</sup> 其三, 气候环境不宜。巴西位于低纬度地区, 绝大部分国土地处热带, 其气候特征与中高纬度的欧洲截然不同。其四, 宗教信仰不同。1824 年巴西宪法将天主教定为国教,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新教徒前往巴西。其五, 缺乏垦殖土地。欧洲移民希望能够得到土地的所有权而不仅仅是使用权, 但此时巴西政府给出的移民条件中并没有这一项。这也是最被欧洲移民所诟病的地方。

<sup>①</sup>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7-30.

<sup>②</sup> Ana-Isabel Aliaga-Buchenau, "German Immigrants in Blumenau, Brazil: National Identity in Gertrud Gross-Hering's Novels", in *The Latin Americanist*, Vol. 50, No. 2, 2007, p. 5.

1850年巴西禁止奴隶贸易后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让引进欧洲移民具有了更大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使其不仅具有生物学、种族主义等理论做支撑，还兼具经济层面的现实意义。在巴西精英看来，欧洲移民既能填补巨大的劳动力缺口，也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还能“改良”巴西的人口结构，从而帮助巴西摆脱“野蛮”迈向“文明”，可谓一举多得。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巴西精英对于欧洲移民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白化”民族的“试剂”能够达成共识，但在其文化角色和经济角色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方面，种植园主及其政治代理人认为，欧洲移民只是名义上奴隶的替代品，他们的经济贡献只在于为促进种植园经济的繁荣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知识精英们和城市中产阶层则主张，欧洲移民能够带来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和生产关系，鼓励他们拓殖小农场，帮助巴西实现秩序和进步。双方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欧洲移民究竟应该做“里子”还是做“面子”？是否应该承担改变巴西经济结构、消除大地产制的使命？前者作为既得利益者，势必要竭力维护自己固有的地位和权力，所以只需要欧洲白人來装点门面；后者作为新生力量，自然希望借助欧洲移民对巴西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不能徒有白色的“外表”。因此，19世纪中期以后，在引进欧洲移民方面，巴西出现了两种由不同群体主导的移民模式：在边远地区垦殖小农场和在大规模种植园实行佃农制。

第一种移民模式的代表分别是兴起于19世纪50年代的私营拓殖协会（Private Colonization Societies）和成立于1883年的中央移民协会（Sociedade Central de Imigração, SCI）。私营拓殖协会得到了巴西地方政府的资助，主要活动是招募移民，帮助他们购买小块地产，并从中赚取差价获利。布卢梅瑙（Blumenau）拓殖地和圣洛伦索德苏尔（São Lourenço do Sul）拓殖地是私营拓殖协会中经营比较成功的典范。两个拓殖地分别建立于1850年和1857年，居民主要以德语国家的移民为主。布卢梅瑙拓殖地位于巴西南部圣卡塔琳娜州，由德裔移民赫尔曼·布卢梅瑙（Hermann Blumenau）创办。在那里德国移民们“清理原始森林，盖房子，建造教堂，尽管他们遭受了许多挫折，但从气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促进了文化机构的发展，比如学校、德语报纸、唱诗班和运动俱乐部等”<sup>①</sup>。圣洛伦索德苏尔拓殖地位于南里奥格兰德

<sup>①</sup> Ana-Isabel Aliaga-Buchenau, “German Immigrants in Blumenau, Brazil: National Identity in Gertrud Gross-Hering’s Novels”, in *The Latin Americanist*, Vol. 50, No. 2, 2007, p. 9.

州，是由普鲁士人雅各布·莱茵甘茨（Jakob Rheingantz）一手创建的。在成立之初，就吸引了1400个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家庭。<sup>①</sup>中央移民协会也是由三个德裔移民赫尔曼·布卢梅瑙、卡尔·冯（Karl von Koseritz）和雨果·格吕贝（Hugo Grüber）创办的，他们把欧洲白人移民视为改变巴西未来的“希望之种”，抨击大地产权制，希望小农经济能打破大种植园主对农业的垄断，坚信小农场势必会取代种植园，并提倡现代薪资制度。中央移民协会的成员基本都是城市中产阶级，持有严重的种族偏见，特别排斥引进华工。他们还曾派代表团远赴欧洲进行游说，以阻止中国外交官与巴西达成招工协定。事实上，中央移民协会的许多建议都被地方或国家政府采纳，其中包括1890年禁止亚非移民的法令。

第二种移民模式主要在巴西东南部咖啡产区运用。在寻找新劳动力来源时，并非所有的种植园主都顽固守旧，一些比较开明的种植园主开始尝试将契约制和佃农制相结合的劳作模式：由种植园主先垫付移民的旅费，并按照家庭规模给其一定数量的咖啡树苗；移民在咖啡收益中分取50%的净利润，并以较低的利率偿还旅费贷款。<sup>②</sup>圣保罗州大咖啡种植园主、参议员德坎波斯（Nicolau de Pereira de Campos Vergueiro）是敢于“吃螃蟹的第一人”。1847年，他说服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给他无息贷款，他用这笔钱派出征募人员前往日耳曼地区和瑞士，这些地方当时正普遍遭受土豆饥荒。同年，第一批80个德国农户家庭被引进到德坎波斯的种植园。这些雇工住在泥笆墙的简陋棚屋里，在分成制的基础上栽种、培育和收获咖啡。<sup>③</sup>相较于奴隶制，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更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后，越来越多的种植园加入这一行列。19世纪50年代，圣保罗州共引进2000多名欧洲移民，他们主要来自德国和瑞士的联邦州。<sup>④</sup>为了抵抗中央移民协会带来的冲击，1886年，儒尼奥尔（Martinho Prado Júnior）成立了移民促进协会，反对国家主导的移民，主张私营公司负责招募和安置移民的工作。该协会代表着咖啡种植园主的利益，成员都是权贵阶层。实际上，移民促进协会已经在扮

<sup>①</sup> 波美拉尼亚位于中北欧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现分属于波兰和德国，居民讲德语。

<sup>②</sup> Thomas Holloway, *Immigrants on the Land: Coffee and Society in São Paulo, 1886 - 1934*,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p. 71.

<sup>③</sup>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三卷），第792页。

<sup>④</sup> [巴西] 赛尔索·富尔塔多著，徐亦行、张维琪译：《巴西经济的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演圣保罗州“移民局”的角色。从1886年年中到1888年年中，该协会招募的移民人数由6000人增至60000人。仅1888年一年就引进了60749名移民，其中意大利移民约有44000人，葡萄牙移民约有10000人，中欧国家移民约有3700人（主要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西班牙人约有2800人。<sup>①</sup> 19世纪末，圣保罗州吸引了近7成的外来移民。<sup>②</sup>

表1 1850—1888年巴西每年引进的移民人数 (单位：人)

年份	移民人数	年份	移民人数	年份	移民人数
1850	2072	1863	7642	1876	30747
1851	4425	1864	9578	1877	29468
1852	2731	1865	6452	1878	24456
1853	10935	1866	7699	1879	22788
1854	9189	1867	10902	1880	30355
1855	11798	1868	11315	1881	11548
1856	14008	1869	11527	1882	29589
1857	14244	1870	5158	1883	34015
1858	18529	1871	12431	1884	24890
1859	20114	1872	19219	1885	35440
1860	15774	1873	14742	1886	33486
1861	13003	1874	20332	1887	55965
1862	14295	1875	14590	1888	133253

资料来源：[美]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王龙晓译：《巴西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3页。

从表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从禁止奴隶贸易到废除奴隶制这38年间巴西移民输入的趋势和特征，也恰恰印证了引进外来移民与废奴之间的正相关性。1850年禁止奴隶贸易后，外来移民人数基本呈直线上升态势；1871年《新生儿自由法》颁布后，移民急剧增加，每年基本都在2万人以上（5个年份除外）；1888年废除奴隶制后，移民人数更是达到了这一时期的巅峰，当年就有13.3万名外来移民进入巴西。

①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69–70.

② Thomas W. Merrick and Douglas H. Graham,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Brazil: 1800 to the Presen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95.

1889年共和国成立后，巴西新政府陆续推出一系列移民新政，比如为移民提供补贴、允许宗教信仰自由等。1891年，巴西联邦政府用在移民上的开支占全年预算的11.5%。在招募移民方面，圣保罗州是最迫切的，所以它是地方政府中在移民事务上花费最多的。1892—1910年间，圣保罗州有7年的移民开支超过全年预算的10%。<sup>①</sup>为了吸引更多的欧洲移民，巴西人在欧洲各大港口设立招募站，站点一般都选择在航运公司旁边，以便于及时运送移民；宣传内容主要突出“共和国”这一巴西新形象。散发的小册子中印着这样的广告词：“欢迎你带着家人来巴西筑梦。这是一片机遇之地，物产丰富。在巴西，你有能力拥有自己的城堡。政府会给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提供土地和工具。”<sup>②</sup>此外，19世纪末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大大缩短了跨洋航行的时间，欧洲到巴西的行程由19世纪初的3个月压缩至20世纪初的2个星期。<sup>③</sup>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降低了旅途中移民的死亡率，再加上欧洲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催生出大批失业工人，19世纪90年代巴西的外来移民人数达到历史峰值，共有1198327人来到南美这片土地，其中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欧洲移民占比高达91%。<sup>④</sup>如果仅从数据上看，巴西精英的“白化”政策在19世纪末成效显著。巴西黑人人口的比重从独立之初的48.5%降到1872年的19.8%，到1890年再度降至14.7%；相应地，白人人口的比重则不断攀升，由1824年的23.8%升至1872年的38.1%和1890年的43.9%。<sup>⑤</sup>

#### 四 结语

综上所述，19世纪中后期巴西的移民问题与废奴问题是相互交织的。随着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的传入，移民对于巴西而言不再只是经济符号，也是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符号。这一时期巴西国内关于华工和欧洲移民间的争论，归根到底是新旧两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较量。一

<sup>①</sup> Gloria La Cava, *Italians in Brazil: The Post-World War II Experience*, New York: Peter Lang, 1999, pp. 18-19.

<sup>②③</sup>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Ethn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4, p. 70.

<sup>④</sup> Maria Stella Ferreira Levy, “O Papel da Migração Internacional na Evolução da População Brasileira (1872 a 1972)”, em *Revista de Saúde Pública* (supplement), Vol. 8, No. 3, 1974, p. 71.

<sup>⑤</sup> [美]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王龙晓译：《巴西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66页。

方面，种植园主及其政治代理人主要是从经济角度看待移民问题，他们最看重的是移民的劳动力成本价值。在他们看来无论华工还是欧洲白人移民，都只是奴隶的替代品。德门东萨在《亚洲劳工》一书中曾直言不讳地写道，“华工是巴西劳动制度从奴隶制到自由劳工之间的过渡劳动力，他们从非洲人那里接手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工作，再将之传递到欧洲人手上；引进华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它既可以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同时也可以为缔造巴西辉煌的未来做准备。”<sup>①</sup>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种植园主的移民政策主张如同其废奴立场一样都是渐进的，这体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立场，其根本目的都是尽力拖住历史前进的步伐，维护自己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与权力。另一方面，种族主义者和知识精英们则更为关注移民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他们希望借助引进欧洲白人和种族通婚开启巴西的“白化”进程，不仅要改变巴西的民族成分，更要对国民的思想文化和国家的经济体系进行全方位“换血”。换句话说，在“提升”巴西人自然基因的同时，彻底改造巴西的社会基因。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他们的移民政策和废奴立场都是激进而彻底的，本质上就是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构筑的经济和政治樊篱，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正是在这场围绕移民问题的全国大辩论中，巴西的民族认同在不断地塑造“他者”和固化“我们”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莫尼兹（José Ricardo Moniz）在国家工业辅助协会上称：“‘苦力’不仅仅是人口问题的一部分，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在农业大会上，一些反对华工的代表将巴西民族认同的构建过程看成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引进华工视为给这个有机体“注入贫穷、堕落的血液，是对种族融合政策的毒害”，而“孱弱的巴西就像在民族认同崩塌的边缘摇曳”。<sup>②</sup> “黄祸论”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萌芽中的巴西民族认同在文化上的不安全感。正如巴西独立运动的不彻底性和经济发展的依附性，这种萌芽中的“巴西人”民族认同也缺少独立性，它是依附于欧洲文化的，是一种欧式巴西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巴西人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

（责任编辑 黄念）

<sup>①</sup> Robert Conrad, “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 - 1893”,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9, No. 1, Spring, 1975, p. 54.

<sup>②</sup>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2 - 25.